

从《归田赋》、《归去来兮辞》 看士大夫对“隐”与“仕”的抉择

陈丽平

(鞍山师范学院 中文系 辽宁 鞍山 114005)

摘要 隐逸是中国士大夫特殊的自我保护方式,在中古时期殊为显著,隐逸原因、方式是复杂的,本文以张衡、陶渊明作为个案进行分析,讨论了隐者归隐后的人生依托,以此为标准,笔者将其分为三类,即隐于朝、隐于市、隐于野,并分析了隐士与政治藕断丝连的联系。

关键词 张衡 陶渊明 隐 仕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441(2006)05-0068-04

Analyzing Scholar-bureaucrat's Choice toward Reclusion and Being an Official Through *Gui Tian Fu* and *Gui Qu Lai Xi Ci*

CHEN Li-p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s & Literature, 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Anshan Liaoning 114005, China)

Abstract Reclusion is a kind of special safeguard way of the Chinese scholar-bureaucrat. It is obvious from Dong Han Dynasty to Tang Dynasty. The reasons and manners about reclusion are complex. The essay chooses Zhang Heng and Tao Yuan ming as a case study to analyze the hermits' supporting sources after reclusion. The author classifies the hermits as three types in court, in the market and out of the office. What's more, the essay analyses the relation between hermits and politics.

Key words Zhang Heng, Tao Yuan ming, Reclusion, Began a official

入仕还是归隐?是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士大夫们经常要面对的人生抉择。自古以来,涌现了众多的隐者:巢父、许由、长沮、桀溺、范蠡等,但他们所具有的特殊文化内涵并不相同。特别是在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入世精神更深地契入士大夫的思想中,当世道幽隐难发挥作为之时,他们常常想到归隐,而其与儒家精神对个人社会责任的期望值之间的矛盾,使身临其境者在“隐”与“仕”之间徘徊难择。即使同样选择了归隐,他们在头脑中对这对矛盾的化解方式也是不同的。“身隐故称隐者,道隐故曰贤人”^[1]沈约在写《宋书·隐逸传》的时候,已经对“隐”做了深入的辨析,并对这个群体进行了简单的细化。归隐并达到逍遥境界,入仕从而实

现“立德、立功、立言”人生三不朽。这是对立的两种人生至境。那些耳濡目染在儒学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传统知识分子,在不得已情况下追求前者时,要首先解决二者的矛盾。

本文选取了张衡《归田赋》和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作为个案。张衡受儒家思想浸润甚深,一生先后任郎中、太史令、侍中、河间相等职,每一阶段都恪尽职守,他虽终身为官,但在他的精神层面也有“隐”与“仕”的抉择。东汉后期,“阉竖”横行,他备受压抑,他两度担任太史令,第二次任职期间,他是报着“朝隐”的目的的,这在他的《应间》里有着明确的说明。“为阉竖所谗蔽,欲游六合之外,势即不能,义又不可。”这表明他为现实所迫想过归隐,在

面临“隐”与“仕”的抉择时有过激烈斗争,但考虑到“义”与“势”放弃了隐的想法。但在宦海沉浮后,他在文学作品中描画了归隐田园的生活图景,这就是在赋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归田赋》。无独有偶,两百多年后晋宋之交的陶渊明,在经历了多年时仕时隐的生活之后,创作了《归去来兮辞》,同样表达了对田园的向往和与官场的彻底决裂。这两篇辞赋都产生于作者在宦海历尽沧桑之后,体现了最终面临“隐”与“仕”抉择当口的特殊心迹。这两篇文章脉络相似,依次交代了归隐原因,归隐后日常生活,对人生意义、理想至境的思索。本文也以此为线索,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对比,探究陶渊明式的隐者与张衡式的田园思考所各具的独特内涵和意义。

一、隐之缘——“心为形役”与“河清末期”

《宋书·陶渊明传》记载了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被认为是导致陶渊明辞去彭泽令的直接原因,其实在《归去来兮辞并序》中,陶渊明对担任彭泽令及辞官过程作了认真回忆与思考,显示了作者的真实心态。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这里说得很坦率,任官是出于经济生活上的考虑,这种表白是真诚的,没有故做姿态的意思,也符合魏晋名士认真的人格特点。任职彭泽令,使诗人不必有衣食之忧,满足了人生第一需求。但为官不长时间,诗人却主动放弃了能给他提供生活来源和生存安全感的彭泽令,使诗人生活陷于困境,可以说这种选择是慎重的,他在《归》中是这样表述归隐原因的:“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深愧平生之志”,“心为形役”。我们看到诗人精神冲突矛盾双方,一为诗人理想,即保持真的本性,实现“平生之志”,这里的“志”,指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即真隐的生活;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庚戌岁九月于西田获早稻》)。这里他引春秋的隐士长沮、桀溺为己同调。隐居无拘无束的、不为形役的生活方式与他的“质性自然”的本性相和谐。“世与我而愿违,复驾言兮焉求”,这里也流露出世道混乱及不同流合污、洁身自好的原因。矛盾另一方,即对“公田之利”的生活需要,即经济生活上的保障。这种思想矛盾归根结底是物质生活保障和理想精神状态保持之间的冲突。陶最终选择了保持本性之真,不惜以丧失生活保障为代价,可见诗人的勇气和真隐士品格。这是一种自觉的发自内心的隐,他宁愿回到“家贫”、“缸无储粟”的生活老路上去,但诗人充满希望,不惜以“形”的缺失换取心灵的真正解脱,并始终无悔。

张衡的归隐想法是与陶渊明不同的,“游都邑以永

久,无明略以佐时”,这实际上是作者感于现实政治的一种自嘲,抑或是牢骚的抒发罢了。欲归隐的真正原因是“俟河清乎末期”。生逢浊世,抱负无由施展,任侍中期间;宦官惧其毁己,皆共目之。——阉竖恐终为其患,遂共谗之。衡常思图身之事,以为吉凶倚伏,幽微难明。〔2〕生活在恐怖的政治环境中,时有生命之忧;“佐时”的愿望更难实现,归隐是他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但作者思想中是难以放弃“佐时”的,因此,“无明略以佐时”,流露出牢骚,这里体现了张衡的社会责任感,这源于他思想中儒家人生观的行为规范,这与陶渊明是彻底不同的,即使在乱世,他也要辛苦经营他的佐时理想。任太史令期间由于政绩显著被顺帝提拔,外迁河间相;“衡下车,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上下肃然,称为政理。〔2〕这是他的真品格,他不厌弃“俗务”,与儒家“经世致用”的社会责任感结合,在现实困难面前,为自己寻找的道路是“朝隐柱史”。但在晚年时,张衡终因“河清不可俟”、“前途幽晦”,自己被压抑太久而厌倦,由朝隐想到野隐,是迫于无奈的选择,是被动的。在这种选择里面,他压抑了他的儒家佐时理想,并没有获得心灵的解放,而陶的归隐,放弃的是物质利益,获得的是心灵的解放和达到理想精神的至境。张衡的归隐想法是有逃避性质的。

二、隐之境——“此中有真意”与“聊以娱情”

官场生活的种种“违己”,迫使陶归返田园。“俟河清兮末期”,张衡在思想上终于放弃了朝隐,他们都找到了田园作为自己理想的乐土,但他们所归之田的内涵是不同的。

陶渊明的田园生活是充实的,包括悠游田园的家庭日常生活;日常与亲戚、邻里的交往;闲暇时郊游外出。陶渊明的田园生活散发着泥土的气息,真淳的情感。他的田园生活透出一种与其心有灵犀的美。更为独特的是他的田园并未与人断绝往来。这里有三重境界:首先,与作者朝夕相处的是恁姿挺拔的松菊,无心出岫的白云,倦飞知还的飞鸟,这些意象已浑然人化,它们是诗人的知己和同类,留连于宁静而充满趣味的小园,兴致所及,把酒而饮,这是一种真正的自由自在,心灵“无滞碍”境界。其次,这里有一种存在于举手投足、不经意间的亲情与邻里情。百里之外,风尘仆仆地归来,首入眼帘的是“稚子侯门”;“携幼入室”这是官场难以实现的天伦之乐。“悦亲戚之情话”,与亲戚日常闲谈中体会亲情的温暖。“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体现的是与邻里和谐的相处,融洽的氛围,是一种自然平淡、愈品愈浓的邻里之情。第三,诗人的真隐士生活包括“将有事于西畴”,诗人亲自参加田间劳动,生计所需,自给自足。头脑中已经没有

“劳心者”、“劳力者”的尊卑之分。诗人已融入田园景物中,成为自然的一部分,达到了物我合一的境界。松菊、小园、云鸟、丘壑、林泉无不与诗人心有灵犀,这是一种田园人生的艺术化。

陶渊明的归隐世界最独特的是后两点,正如钟惺《古诗归》所说:“高人性情,细民职业,不作二义看,惟真旷远人知之。”陶公山水朋友诗之乐,即从田园耕凿中一段忧勤讨出,不别作一副旷达之语,所以为真旷达也。”正因具有亲情、邻里情的内蕴,有与正常人的交往,他亲自耕耘,使生活物质基础有所保障,这种生活不是来自云端,它具有现实的可行性。

归隐之时,陶已看破生死,看轻富贵,他的人生态度“聊乘化以归尽,乐乎天命复奚疑”,他描画的至乐生活是“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耕耘”、“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日常耕耘劳作中,享受生命;“质性自然”的本性有所依附,在实现了“平生之乐”后心安理得,在平平常常中体会人生滋味。他的人生至境就在这看来平平常常的田园生活中。闲暇时的登高舒啸、临流赋诗,是典型的魏晋名士们的生活方式,陶渊明的“自然之性”很大程度上是玄学家的品格赋予的。他的归隐要过无拘束的生活,结束心为形役,他的“耕耘”、“赋诗”、“舒啸”就是“乐乎天命”的选择。

我们再看张衡所构建的田园生活,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对田园美景的欣赏,这是一幅百草滋荣、鸟儿高唱的早春图;二是山泽间渔猎生活;三是晚间的著书。作者在田园中体会到了游历的“至乐”、“逍遥”,陶醉于美妙的视听感受,以达到“聊以娱情”的目的。另外,张衡的田园是不同于陶渊明的,陶的性情、理想至境与田园、日常生活、生活生计所需合而为一。而张需要田园满足他的“娱情”,田园是他观赏、休闲的对象,他的儒家致仕的理想与他的田园生活没有必然的联系,他的田园也无从解决他的生活来源问题,从而有解闷的意味,他与自然是主客的关系。因此,张衡的田园生活构想不具有现实可行性。实际张衡并没有田园生活的经历,他的其它作品中也罕见真实的田园。《归田赋》的这一番描画,是把田园作为一种政治重压下寻求解脱的精神乌托邦。归隐并不意味着不关心现实政治,他们在田园中提出自己的理想。

“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张要达到一个超然物外的境界,这个“物”指的是官场的俗物,功名利禄。最终,心还是要有所系的,这就是舜之道,周公、孔子的书籍,上古圣皇树立的法则。内心还固守圣君贤臣的理想,现实生活中“俟河清末期”,但在内心还执着于清平治世,因理想在现实中无法实现,只好寄托于精神层

面、理论层面。这样的追求与现实反差太大而让他无法忍受,只好在没有官场污浊的田园中固守这份真。但他的这份理想与田园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他的田园与理想是脱节的。他的这套理论是关于“人”的、“民”的,但他的田园世界没有与外界的往来,是脱离实际的乌托邦,对他而言,田园的意义存在于求得心境平和,是解闷、娱情所在。人生至境在于田园之外的“陈三皇之轨模”。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古代士大夫的归隐之路是复杂的,他们隐的动机、方式、境界是迥然不同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隐士的存在是不引人注目的。就这一群体在史书中的记载来看,《史记》中留侯张良、商山四皓、“日者”司马季主、浪迹江湖的范蠡,他们的行为都是不同形式的隐,但司马迁并没有把他们单独划归一个门类。隐逸行为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蔚为大观,成为一种时尚。从《后汉书》中赫然出现“逸民”这一群体,到以后正史中的“隐逸列传”、“高隐列传”、“处士列传”,可见这个群体生命力之强。然而,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象“张衡式”的人物,在正史中是逸出这个群体而单独成传的,但在这些人物身上有浓厚的隐思想,甚至也曾有过或长或短的隐逸生涯,如谢灵运。本文基于以上个案分析,现试将这个群体加以梳理,并得出如下结论:

(一) 隐者归类及对人生境界的影响

从隐士群体在正史中出现开始,史家们试图将其归类,如沈约在《宋书·隐逸传》所做的分析:“身隐故称隐者,道隐故曰贤人”,隐士们行为方式和思想是复杂的。笔者认为,应该充分重视隐士同一生活时代人的评价,从而判断其是否真隐,后代史家离这些人生活时代较近,收集大量相关史料,他们的结论相对来说是接近历史真实的。据此,正史中“隐逸传”中的人物大多可划为真隐,史书中其他有隐思想或有过隐生活经历的人物是准隐。

真隐是在主体的灵魂深处、实际行动两方面都达到纯粹“隐”的境界,这部分隐者对社会、政治有个人见解,归隐后有机会出仕,但能坚持隐的选择,他们在作品中保持自己鲜明的政治立场、观点,但绝不介入政治。陶渊明可以作为真隐的代表。准隐是身、心隐得不彻底,或“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或见机而动,时隐时仕,这些人往往身居显位,在正史中有一席之地。如谢灵运、嵇康、阮籍、左思等人。实际上,这两类人物内部也有许多明显的差别,如同是准隐,谢灵运是迫不得已、策略的隐,嵇康属于愤世嫉俗、决然而隐,阮籍是迫于时势、身仕心隐的苦隐,左思是代表了有晋一代“身仕心隐”的时尚。隐者既然疏离了政治,在生活环境、谋生手段上必须有新的依托,以此为标准,笔者将其分为三类,即隐于朝、隐于市、隐于野。

朝隐者是准隐的典型。他们即可在物质上接受官府

提供的生活保障,又可在“无为”等朝隐理论下过“逍遥”的生活。如东晋谢安就是典型代表。但从精神层面而言,“兼济天下”、“独善其身”都始终要追求一种独立的人格与自由,朝隐的士人,既然内心已疏离政治,但却身处其位,在其位,谋其职,对士大夫是一种道德要求。因此现实生活中,“言不由衷”、“行不由己”对朝隐士人是一种莫大讽刺,从而丧失了士人的独立人格。我国古代实行的是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的政策,但由于士大夫的个人特点、兴趣所致,一部分隐逸之士走向了世俗生活和经商之路,如范蠡、司马季主,他们发挥了自己的一技之长,自食其力,保持了士人的人格独立和自由。

隐于自然,这是一种主流选择,隐士于山水田园间劳作休息,自然提供他们物质生活所需。在精神层面上,自然对隐士有双重意义,第一、自然成为他们艺术创作的素材。隐士流连山水田园间,发现、欣赏美的同时,用自己的方式体现山水田园美,于是创作了大量的山水田园诗、山水田园画以及音乐。陶渊明在艺术上把田园世界写进诗歌,成为田园诗的鼻祖;谢灵运把山水写进诗歌,成为山水诗歌史上开山式人物。嵇康在音乐实践及理论上达到了时人难以企及的高度。第二、传统似乎习惯于山水比德,对一些隐者而言,山水自然已拟人化,成为隐者人格的对照物,成为隐者的知音,如陶渊明。

另外,这两类人的命运也是不同的。真隐者与政治疏离较彻底,这使他们远离政治迫害,往往善终。准隐者一般身心冲突较激烈,与政治疏离不彻底,善终者寡,如谢灵运、嵇康等人。

(二)隐,不意味与政治彻底决裂,真隐、准隐尽管从表面上疏离政治,但他们在归隐后不曾忘怀政治,而是以另外的姿态在关注政治

准隐者往往隐得不彻底,机会来了,他们不会放弃与政治结缘。而真隐者与政治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以陶渊明为例,在他的心灵深处,有的不仅仅是他的田园风情、秋菊青松。“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正

说明陶渊明确是有用世之志的,只不过“世与我而相违”,并且“乐乎天命”的思想让他不必“惶惶之”有所争。这是以玄学思想和“乐乎天命”的人生态度消解了他的社会责任感,使他选择“独善其身”、“洁身自好”。但他亲历的田园劳作让他生活困苦,狼狈不堪,这是选择归隐的代价,诗人是有思想准备的。这种自食其力换来的生活并不公平,他在诗中这样总结这种社会不公:“在己何怨天”,这恐怕并不能代表他的真实观点。我们看他在《桃花源记并诗》中构想的理想田园生活,没有“税收”、“战争”,说明他已认识到官府的“税收”、“战争”是农民贫苦之源。他对现实政治是反感的,有自己治理社会的一套方案,但在“乐乎天命”的思想和玄学家生活方式的影响下,既然选择归隐,他只能在理论层面实现他的社会理想蓝图,这就是根据他的田园生活实践,已经完善的、改良的《桃花源记》中的“世外桃源”。

另外,陶渊明的后期诗文反映了他对政治的真实态度;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1]这说明诗人在思想上是不承认刘宋政权的,他没有采取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做法,而是通过不记年号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抗争。在《咏荆轲》、《读山海经》中,对于荆轲、刑天、精卫式人物的赞美,对他们敢于与暴政抗争、执着的精神是钦佩的。归隐之后,陶渊明的社会责任感体现在诗文中的“微言大义”。陶渊明的社会责任感在“乐乎天命”的思想和玄学思想消解下并没有完全消失,这些残存在诗文中的政治关怀,是消极的抗争,但对保持诗人心灵的净土是具有巨大意义的。

参考文献:

- [1] 沈约撰. 宋书·隐逸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2] 范晔撰. 后汉书·张衡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3.

(责任编辑:赵春秀)